



拆迁安置社区治理结构变迁及其机制研究

——以南京市S新村社区为例

宋喆

(南京师范大学 研究生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随着国家城镇化建设迅猛推进,拆迁安置社区不断涌现。S新村社区由XL农牧场转变而来,过去,XL农牧场社区管理结构是以“场带队”形式实现,行政管理与社区管理高度统一。转变为新型社区后,社区居民的生计来源多样化,社区由物业进行管理,但居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并没有随之改变,这大大增加了社区管理难度,也由此带来了“社区失灵”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提高拆迁安置社区治理水平,就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发挥好社区基层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功能,大力培育社区自治组织,统筹处理好社区管理、社区自治和社区物业之间的关系,从而使社区治理走上善治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拆迁安置社区;“场带队”;新市民社区;“社区失灵”;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15)03-0019-07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预言,影响21世纪世界进程和改善世界面貌的两件事分别是美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和中国城市化进程。当前,在迅猛发展的城市化大潮面前,大量的拆迁安置社区不断涌现。许多安置社区治理方式严重滞后,社区治理上“换汤不换药”,依然延续传统村庄治理模式,与现代化城市社区建设相去甚远。拆迁安置社区治理方式亟需作出相应的调整和规范,以适应城市化新型社区发展的社会诉求。

所谓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互相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思维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保留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1]。社区治理,是指一定社区范围内政府、居委会、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和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推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活动。^[2]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社区治理组织形式基本以“单位制”为主。传统“单位制”社区的典型特征是社区管理的“单位化”。“单位”集生产、生活、资源配置和社会管理于一体。国家通过一个个“单位”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整合、管理与控制。社区组织全部融入“单位”之中。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化,单位的大量改制与破产使传统“单位制”逐渐走向解体。“单位制”解体让大量原来依附于单位而存在的居民走向陌生社区。路风认为,“单位制”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它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基础,“单位制回答了政府为什么推行社区建设以及为什么在社区建设中重新构造以社区制为基础的政府与社区合作治理的新型管理体制的问题。”^[3]陈伟东的研究显示,在“单位制”解体和“单位人”转为“社会人”之后,因为缺乏新的组织形态来承担社会服务和社会整合,政府的社会性职能以及既往企业的社会性职能在转移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衔接,亟需建立一种新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来缓解社会矛盾^[4]。陈建胜认为,拆迁

收稿日期:2014-09-12

作者简介:宋喆,男,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党工委书记,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移民社会学。E-mail:zsong@njnu.edu.cn

安置市民社区建设需要建立起与城市社区相对应的管理体制,使管理型社区结构逐渐转为服务型社区治理结构。为此,要强化社区内的平台建设,使社区能够承接利于社区发展的服务项目。^[5]赵守飞、谢正富则提出,拆迁安置社区需要在社区治理主体间及内部建立起完善的合作机制,以形成合作治理的社区发展方向。^[6]魏文斌的研究显示,就近年来我国在城市社区治理上所形成并推广的“上海模式”“沈阳模式”和“江汉模式”等社区管理模式来看,其实也各有利弊:“上海模式”代表着社区行政主导型,政府力量强大,社区行政负担重,社区内自治组织薄弱,社区居民参与热情和参与度不高;“沈阳模式”突出强调社区自治,把社区重点放在居委会。由于政府角色缺位,社区内各组织间的运行机制不够协调;“江汉模式”把社区定位为居委会与街道之间的一个组织形态,强调政府与社区之间的互动和共生,存在着社区行政化倾向明显,社区内部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7]俞可平认为,要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真正在社会领域实现善治,既需要强有力的社会管理,更需要高度的社会自治。^[8]

综上,社区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管理过程。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创新社会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的思路,以能够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在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矛盾,必须妥善解决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拆迁安置社区治理问题,使社区治理与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相适应。本文所考察的 S 新村社区,是一个“二元体制”国营企业农牧场改制后所形成的拆迁安置社区,其治理结构变迁具有典型意义。

一、“二元体制”的农牧场解体与 S 新村社区形成

XL 农牧场是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南京市东郊仙鹤山脚下建立的一个以供应南京市民牛奶和蔬菜为基地的农牧场。作为中国社会变迁典型城乡“二元结构”的“场带队”农牧场,其发展经历了从兴旺到衰败的过程。

据南京市志记载,清朝同治年间(1846 年),仙林地区行政区划归属于上元县城北乡。民国初年(1913 年)并入江宁县,此地仍为城北乡。1950 年,国家土改时期,单独建制改为 XL 乡。1959 年 10 月,南京市属国营农场从麒麟门东流镇迁至 XL 农牧场,作为南京建立和发展副食品生产基地。农场根据“自然区划”“生产需要”和“方便领导”的原则,将其划分为三个大队,并先后建起了养鸡场、种马场和奶牛场,同时将原来属于尧辰分场的果树队、茶叶队调整为农场直属单位。1961 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三个大队由全民所有制退回到集体所有制,实行“以大队为基础,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体制,而其领导关系隶属于南京农场。1962 年,南京农场迁出后,在原址成立 XL 农牧场(图 1)。农牧场实行“场带队”管理体制。作为“二元体制”结构的 XL 农牧场,农牧场职工长期以来享受着国有企业待遇,“场带队”成员性质上还是农民。



图 1 XL 农牧场历史沿革图(1846—2002)

20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中国高等教育大扩招、大发展,市区内的多所高校纷纷到市郊建设新校区。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拆迁安置相对简单,XL农牧场被南京市视为建设大学城的理想之地,很快规划并付诸实施。随着大学城不断开发,“场带队”农民陆续转为市郊居民。农牧场土地被大量征收,部分“场带队”自然村撤消建制。自1994年起至2000年,XL农牧场第一大队所属的门坡、大塘、东码头、侯井、吕家山等自然村陆续撤消村部建制,庞宝、田子下、于家岗等三个自然村并入第三大队。1994年3月,农牧场在测量完土地后,即对茶场、东码头、大塘、门坡四个自然村共281户1255人进行了房屋普查和人口核实以及办理“农转非”手续;1997年4月,对侯井、吕家山两个自然村777人进行了房屋普查和人口核实,办理了“农转非”手续;2000年10月,并入第三大队的三个自然村土地被大学城征收。

根据大学城统一规划,XL农牧场第一大队5个行政村整体上迁移到S新村社区。“离土不离乡”作为中国传统农民的沿袭,对于离开聚居地的迁移难以割舍“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7]¹¹ S新村社区建设初期,由于社区居民都来自农牧场的职工和“场带队”农民,他们的单位归属意识很强,社区归属感较弱,加上社区自治组织缺乏,所以S新村社区在最初的社区治理方式上一直延续着传统“场带队”的治理模式。稍微不同的是,街道专门成立“农牧场托管中心”,就原农牧场企业职工相关事务进行处理;而“场带队”的“农转非”村民则基本上由新成立的S新村社区居委会负责管理。

国有单位社区向现代社区的过渡和转型,意味着传统既有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解体。在社会学者眼里,乡土中国的基本研究单位是村落。因为中国乡土社区的基础单位是村落,不管是三家村还是几千户的大村,村落是血缘、地缘关系结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圈子,是一个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而且是一个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9] S新村拆迁安置的现实情况则意味着传统乡土村落的衰落。现在国家对待拆迁安置农民所采取的措施一般都是集中居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被上楼”。“被上楼”破坏了原有乡土社区的基础单位,同时也使原有村落社区在新的拆迁安置社区面前不得不面临新的社区重构。

长期以来,社会学者一致认为,实现农民市民化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城乡融合的根本路径。工业革命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对英国圈地运动导致大量农民失地的现象进行过无情抨击,然而他们对失地农民城市化的意义却给予了充分肯定。马克思认为,城市和乡村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10] 就国家发展的现实情况而言,农民城市化是渐进的和有条件的。当那些为拆迁付出巨大代价的农民发现他们赖以生存的“单位”已经随着社区变迁和转型不复存在之后,他们难以摆脱对未来生活的不安,觉得“只是作为一个改革的包袱被甩掉”而已。

二、S新村社区与社区治理结构变迁

从松散在周边“场带队”的自然村落到S新村的集中居住,S新村的“农转非”市民经过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快速跨越过程。在这样一个跨越中,“农业没有了,耕地没有了,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方式没有了,血缘、地缘关系在快速的社会流动中也变得松散了,村落社会生活管理的职能在形式上也被取消了”^[8]⁶⁸。在农牧场“场带队”时期,农牧场实际上掌控着农牧场职工和“场带队”农民个人社会生活的资源和身份的合法性,使得个人必须借助单位和国家发生联系。甚至包括各个自然村支部书记的任命和农民农作物的种植,农牧场场部党委都有着绝对的决定权。因为农牧场有条件集生产、分配、消费、社会化、社会控制、社会参与以及互助等社区功能于一身,实现其基本控制功能。

在农牧场解体之后,期待S新村的“社区制”完全替代“场带队”的“单位制”,既不具备现实条件,也不为社会成员所认可。早在2002年农牧场解体前夕,南京市政府已将XL农牧场列为栖霞区政府直属单位加以管理。随后,在街道专门成立托管机构,处理农牧场遗留事务,其他的则交给S新村社区处理。由于S新村社区与其社区成员之间并不存在资源约束或契约约束的关系,难以形成对社区成员的路径依赖。所以,S新村社区的权利也仅仅限于目前其被街道赋予的一些职能。社区居

委会目前下设“人民调解委员会”“治安保卫委员会”“计划生育和卫生委员会”“社会保障委员会”“环境卫生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六个部门,以对接街道的工作部署。

社区治理上,S新村社区居委会沿袭了“场带队”时的村庄治理模式,让原在村庄里的“熟人”来管理社区。现年56岁的于主任现任S新村居委会负责人,至今已经担任了9年社区主任,属于传统社区治理研究中的“能人”。9年的社区工作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于主任原属于“场带队”第一大队的人,被街道安排在其他拆迁安置社区负责居委会工作。XL农牧场拆迁以后,他又调回S新村。再次回到居住的社区工作,根据街道领导的解释,最主要原因在于他是“土生土长”在一大队的人,而平时社区里经常上访、闹矛盾的都是一大队的拆迁安置居民“闹得最凶”,他算是临危受命。另外一个解释是,当国家关于居委会管理的新规定出来后,要求居委会主任都必须是在本社区居住的原居民。从政策上来讲,他在异地担任居委会主任不太符合规定,不适合继续在那边工作;还有就是S新村社区这边缺人。尽管S新村居民被安置到位,但是农牧场遗留问题很多,拆迁户上访和堵路等矛盾比较集中。在最棘手的时候,街道主管领导想到了他,认为他对S新村社区情况了解和熟悉,对社区“维稳”有帮助,于是想方设法把他调回S新村。

一般情况下,将于主任调回新村居委会需要经过正式与合法程序。目前,我国基层居委会都是由居民选举产生,所以得走合法的选举程序。从程序上说,选举肯定不是漫无目的地选举。选举前,街道领导会有一个看好的社区候选对象,在选举前都会预先成立一个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确保街道领导看好的对象当选。如果领导看好的对象落选,那就说明选举委员会工作没有做到位。金太军的研究显示,目前,我国许多乡镇把村委会当作自己的行政下级或者派出机构,仍然习惯以命令指挥式的管理方式对村委会从产生到日常工作进行行政干预,使他们认为“听话的”“有能力的人”当选。^[11]居委会主任看似一个芝麻官,但是上级领导也不会随意安排一个人在这个位置上。能够被街道领导看上的人,能力各个方面都还可以,而且必须是政治素质很可靠的人。“你想想看,社区里事情那么多,许多人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好管理,一般人处理不了。”的确,街道领导需要那种既了解社区,有一定群众基础,在社区里有人缘、有威信的人,社区里不管出现什么事,他都能“搞得定”“摆得平”。原因很简单,没有人希望社区出现问题。如果一个人稳定不了社区,一旦出现乱子,那么街道也会很麻烦。这恰恰意味着“主张村落权力的,就是这些领袖人物中能够对内对外把各种利益关系‘摆平’的代表人物”^{[8]72}。

S新村社区由于规划之初就缺乏顶层规划与设计,导致社区居委会慢慢变成了“物业管理”。社区居民对集体参与社区管理缺乏积极性,社区管理者也很难找准自己的工作定位和突破口。就S新村社区管理者而言,他们既有工作难度,同时对目前从事的工作也很悲观。在这些社区管理者的眼里,拆迁安置的新型城市社区要管好,“得牺牲一代人”。

“现在60岁往上走的这一代人,包括50岁左右的人以前基本都是‘场带队’的农村过来的,有一种小农民意识,自给自足的农民经济,还有好多农民的习惯在里面。如果这一代人不走掉的话,可能在小区文明程度提高这一块肯定会受到影响。50岁以下的人比较好一些,观念转变比较快。老年人观念就很难丢,他丢不掉,包括以前农村使用的农具,现在没有田,没有地了,但他什么东西都不丢,他就放在那里看着,看着心里就踏实。哪怕十年二十年用不上,他也不丢。所以这也是我们城市管理中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现在,许多大学过来之后,为了整个农牧场地区的稳定,把原来的农民留在了仙林,但与整个高校大学城这一块不协调……”

在S新村社区治理中,“这一代人死光了就好了”的观点不在于少数,甚至还有人曾经动议把S新村社区整体搬迁到十公里外的一处拆迁安置点。在他们看来,S新村的存在,有碍观瞻,太影响大学城的形象。

传统单位制下的社区管理主要表现在社区管理“单位化”,即管理空间的单位化、管理组织的科层化、单位功能的全能化以及社区管理主体的单一化。对于XL农牧场而言,过去农牧场职工有事情可以直接找场部领导,“场带队”农民有事情直接找村长。目前在拆迁安置的S新村社区里,居民们

都不再拥有原“单位制”下的便捷。S新村日租房需求旺盛,拆迁安置社区居民为了生计,利用自己的住宅经营日租房的比比皆是。为了社区管理和社区“维稳”需要,S新村社区采取了网格化的社区管理模式。具体做法是:整个社区划分为14个网格区域,每个网格分别有2~5幢楼的工作任务。社区管理中聘任的“格长”和“楼长”一起参与社区管理。网格化管理似乎想解决社区治安的死角问题,而且已经具备了现代社区治理理念的雏形。由于S新村拆迁安置居民的生计问题难以解决,管理者对社区的控制反而引起了社区居民的反感,使社区治理进一步增加了难度。

目前,在我国社区转型和变迁过程中,社会支持网络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由于在市场转型中发生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换,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单位支持弱化,而新生的社会支持体系还需要时间发育成熟;另一方面,现代化转型使“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社会”,人们在“熟人社会”中结成的以血缘、地缘为依托的私人社会支持网络变得非常脆弱。为了适应巨大社会变迁的新情况,就需要重新构筑社会支持网。^[12]深度观察XL农牧场社区变迁,在从“单位人”走向“社会人”,两类不同群体的“新市民”成为“熟悉的陌生人”之后,新型城市化社会支持网的建立,最重要的要依托新市民社区支持来实现。其中,社区接纳和包容应该成为社区治理最基本的支撑点。而社区主动抛弃、放弃新市民才是社区建设面临的重大危险。这一切都在考验着社区管理者的智慧。

三、提高拆迁安置社区治理水平的几点思考

“场带队”的农牧场到S新村社区变迁,既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转型发展的必然。在“二元体制”农牧场的单位制时代,社区成员之间经济、政治、社会身份与法人单位的XL农牧场组织高度关联。在XL农牧场逐渐向城市化迈进之时,社区成员之间的经济、政治身份与单位组织基本无关,社会身份关联弱化,城市社区组织已经基本无经济功能,甚至也失去了救助功能;S新村的社区作用和功能与XL农牧场“二元体制”时期相比较,也已经大大弱化。在此基础上,熟人治理策略已经难以奏效。

S新村社区只是当前我国新型城市化拆迁安置居民社区进程中的一个缩影。要把拆迁安置新市民社区建设好,须转变既往社区治理思路和管理理念,改变目前基层党组织薄弱涣散的局面,把政府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加大基层社区管理人员专业培训力度,加强社区社会工作专业队伍建设,推进社区工作人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尽快实现从管理型社区向服务型社区转变。此外,要积极推进社区居民依法民主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发挥好业主委员会、专业物业管理机构和驻区社区单位的积极作用。同时,要积极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和管理,使社区真正成为拆迁安置新市民的幸福家园。

第一,调动政府的力量,把争取政府支持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任务。S新村社区既属于区政府下属的XL街道管辖,同时也接受大学城管委会的领导。这种“双重被领导”的身份给予了其便利条件。尽管社区多一个婆婆有可能多一些事务,但是也会获取到更多的关心和财政支持。政府对社区的支持既包括财力支持同时也包括智力支持。S新村北区,由于建设初期基本标准要求较低,楼房明显破烂不堪,在房型设计上也不太合乎一家多口人居住的现实需要。如果小区出新改造,得争取政府部门必要的经费投入和支持。此外,拆迁安置居民生计问题的解决必须得依靠政府帮助。目前社区里面“黑车”运营和“日租房”随意租赁的问题十分普遍,管理比较混乱。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出面协调解决。

利用政府力量,须防止“社区失灵”。所谓社区失灵,即社区公共管理的失灵或者失败,是社区不能有效发挥管理作用,社区内的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的过程或者结果。街道或者管委会尽管是社区的上级主管部门,但是它们不能成为社区公共管理的主体。目前许多拆迁安置社区由于居民矛盾较大,问题较多,导致社区上级主管部门越俎代庖,剥夺了社区居委会的社区管理权,使真正的社区丧失实际意义上的治理。^[13]S新村社区治理一定要避免社区失灵。

第二,发挥好社区党支部和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作用。基层社区党支部作用的发挥,对于拆迁安置

新市民社区而言十分关键。S新村社区在拆迁安置之初,部分党员率先拆迁和入住,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现在,社区动员过程中党员也一直在发挥着带头作用。比如,社区“维稳”和社区周边网吧的监督管理,老党员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充分发挥社区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可以对社区建设起到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此外,社区居委会必须转变工作理念,从过去的“要我做”转变为“我要做”,尤其在促进社区居民就业和社区助残和养老方面下大气力,使社区居民真正分享到拆迁安置以及城市化发展带来的红利,使社区居民感受到社区组织的温暖。

第三,积极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发挥好社区自治组织的功能作用。长期以来,S新村居民社区认同感较差,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的热情不高。有时社区管理者和社区居民之间的利益矛盾得不到有效协调,从而导致社区管理矛盾较多。社区业主委员会形同虚设,加上居民社区归属意识不强,使得许多居民对社区管理缺乏兴趣和热情。社区建设必须充分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让广大业主一起参与社区建设,使居民真正把社区当成自己的家。这样,在“单位制”解体,居民失去原来“单位制”依靠之后,可以把社区当作依靠,让大家一起来维护共同的家园,共同参与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另外,依靠业主委员会来制止社区内侵占公共领域“搭便车”事件时也就有了充足的说服力。

第四,理顺和处理社区管理与物业管理公司专业管理之间的关系。S新村社区由于是拆迁安置社区,所以社区居民从来不交纳物业管理费,社区物业管理一直由居委会代管。社区卫生、保洁以及公共设施维修一直让居委会头痛不已。物业管理体现了社区物业的专业化程度和水平。尽早成立专业物业管理公司,使物业公司切实履行专业责任,有助于社区居委会从日常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帮助居民解决更为重要的社区问题。

最后,借力引智,汲取大学城丰厚的人文资源。S新村社区地处11所大学的“大社区”中,大学的集聚形成了浓厚的城市人文环境。大量的专家学者可以为社区建设献计献策,大批的大学生志愿者能够为社区治理和社区发展注入新活力。这都是难得的宝贵财富。如何充分利用好专家学者和大学生志愿者的力量,为拆迁安置新市民社区发展出谋划策,以形成发展合力,是S新村社区治理与发展的重要抉择。

四、结论与讨论

透过S新村可以深度观察到,在新市民社区治理过程中,首先得高度关注拆迁安置居民的生计替代。恢复和加强社区管理职能,必须恢复社区组织的经济功能,充分解决好拆迁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不仅仅是给予他们一个新的身份。另外,还要充分考虑多元化的生计替代模式,不断增强新建社区的造血功能,加大扶困济弱力度,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位新市民,努力使这些新市民顺利实现社区融入,实现“有序生计组织替代”。

其次,在新市民社区治理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在新的生计组合模式、新的社区结构和新市民阶层出现的新情况下,长期以来“单位制”下的社会管理老办法和老思路已经不再灵验,“重管轻疏”的管理模式和思路应该逐渐在社区变迁过程中得到改善。XL农牧场社区管理和建设的思路说明,在社会管理创新中亟需前瞻性顶层设计,以切实理顺政府、社会和新市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实现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新市民的良性互动和互益共赢。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充分关注到新市民的社会参与角色,使他们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成为社区管理创新的参与者和知情人。

再次,在新市民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区治理模式可以借鉴,更要结合社区具体情况,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认真分析不同社区面临的基本条件和环境,充分挖掘社区优势,防止出现“城市农村化”。S新村社区治理与建设过程中更要充分利用好大学城人文底蕴丰厚、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努力解决转型新市民社区面临的文化断层和文化匮乏问题,使社区治理走出一条适合新市民建设与新发展的新路子。

参考文献:

- [1] 隋玉杰. 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三种理论视角的探讨[J]. 探索, 2014(4):131-134.
- [2] 郭凤英, 陈伟东. 单位社区改制过程中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1):44-48.
- [3] 路风. 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J]. 中国社会科学, 1989(1):71-88.
- [4] 陈伟东. 单位管理模式转向社区治理模式[J]. 理论月刊, 2000(12):3-9.
- [3] 陈建胜. 城乡一体化视野下的农村社区建设[J]. 浙江学刊, 2011(5):41-46.
- [4] 赵守飞, 谢正富. 合作治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J]. 河北学刊, 2013(3):154-158.
- [5] 魏文斌. 城镇化进程中的社区管理转型思考[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6):70-73.
- [6] 俞可平. 更加重视社会自治[J]. 人民论坛, 2012(2):8-9.
- [7]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9.
- [8] 李培林. 村落的终结[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34.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470.
- [10] POWERS, CHARXLES H. ViXLfredo Pareto. BeverXLy HiXLXLs[M]. C. A. :Sage Publications, 1987:120.
- [11] 金太军. 村庄治理中三重权力互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J]. 战略与管理, 2002(2):105-114.
- [12] 王道勇. 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现代性变迁[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109.
- [13] 康宇.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发展历程及现实困境[J]. 贵州社会科学:2007(2):66-67.

(责任编辑:李良木)